

○专题研究

编者按:本刊语言哲学栏目中的“专题研究”既包括语言哲学本身的有益探索,也包括将语言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相邻学科的应用性探索。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何清强、王文斌从英汉动词 be 和“有”的异同分析切入,揭示两个动词不同的深层缘由在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赵燕则通过对“第二届岭南翻译与教学学术研讨会”的观察,得出结论:西方语言哲学是当代中国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 “be”与“有”:存在论视野下英汉基本存在动词对比\*

何清强 王文斌

(宁波大学,宁波 315211)

提 要:本文以存在论为视角探究英汉存在动词“be”与“有”的差异,阐明英汉分别选择“be”和“有”充当基本存在动词的存在论理据。同时,本文考察“be”与“有”的动词性差异,借以阐发“be”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有”具有空间性特质,其深层缘由在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存在;时间;存在动词

中图分类号:H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4)01-0020-6

### “Be”and “有”: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Basic Existential Verb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He Qing-qiang Wang Wen-bi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istential verbs “be” in English and “有”(have) in Chinese, and presents the ontological rationale for the selection of “be” to be the basic existential verb in English and “有” in Chinese. It also looks into the verbal discrepancies respectively demonstrated by the two verbs in the two languages, with a view to making it clear that “be” has the trait of temporality while “有” has the trait of spatiality. The deep-seated reason for this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divergent interpretation of “being” and “time” expressed i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ies.

**Key words:** being; time; existential verb

#### 1 引言

##### 1.1 问题的提出

关于英汉存在句的对比,学界研究成果颇丰。Huang(1987)、顾阳(1997)、韩景泉(2001)、张达球(2006)、张珂(2008)、李莹(2009)、孙德林(2010)、张律(2011)、郑香清(2011)等学者分别依据结构主义语法、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

法等理论对英汉存在句进行了对比研究,揭示了英汉存在句诸方面的差异,并解释了其差异的原因。然而,对于英汉存在句种种差异源自英汉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深层端由,学界却鲜有涉及。高文成(2008)是为数不多的在英汉存在句对比研究中顾及哲学的语言学研究者,但他所提到的哲学思想仅限于语言哲学和经验现实主义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研究”(11BY018)的阶段性成果。

学,并未触及存在论(ontology)<sup>①</sup>所关注的“存在”(being)<sup>②</sup>问题。

本文将聚焦英汉基本存在动词“be”和“有”,从存在论入手,追索英汉基本存在动词差异源自民族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因,力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为何英语的基本存在动词为“be”,而汉语的基本存在动词为“有”?第二,“be”和“有”所表现出的动词性<sup>③</sup>有何差异?其原因何在?

## 1.2 英语和汉语存在句及基本存在动词

英语存在句的结构型式一般为“there + 存在动词 + 存在物 + 处所”,存在动词可由“be”,“stand”,“exist”等词充当,但从统计学意义上讲,“there + be”结构是英语最典型、最普遍的存在句式(张绍杰 于飞 2004),“be”也就因此成为英语最基本的存在动词。例如:

① There is a person in the room.

汉语存在句的结构常为“处所 + 存在动词 + 存在物”。根据存在动词的不同,汉语存在句可分为“有”字句、“是”字句和“v着”句。例如:

② 村口有几棵大槐树。

③ 村子前面是一条小河。

④ 墙上挂着一幅字画。

表存在的“有”、“是”和“v着”3者中,“有”产生的时间最早,先秦文献中就出现了表存在的“有”字句,如“野有死麋,白茅包之”(《诗经·国风·召南》)。“有”字存在句在数千年的汉语发展史中结构稳定,如《诗经》中的“南有樛木”、“山有枢”、“汉有游女”等,其结构与现代汉语一致,识字之人即可读懂。此外,“有”字存在句地域分布广,《诗经·国风》所记载的十几个诸侯国的民歌中均有用例,如“中谷有蓷”(王风)、“山有扶苏”(郑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魏风)、“山有苞棣”(秦风)。然而,“是”字在先秦两汉为指示代词,作为系词的用法迟至六朝才出现(王力 1937),表存在的用法则更晚形成。表存在的“v着”最早见于宋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用例逐渐多起来。由此可见,“有”字存在句历史最长,且结构稳定,地域分布广,当属汉语最典型的存在句式,“有”因此成为汉语最基本的存在动词。

## 2 英汉存在动词“be”和“有”的哲学理据

如上所述,“be”和“有”分别为英汉基本存在动词,然而,英语“be”最常用、最基本的语义相当于汉语的“是”;汉语“有”的本义为“占有”,与英语的“have”相当。我们认为,英汉民族对“存在”问题看法的差异是英汉基本存在动词差异的根源。

从纷繁的现象世界探究其本原,即世界之最高“存在”是哲学的基本任务。该如何从具体事物中把握超越经验的本原,由“形下”进入“形上”是不同民族思考世界本原的逻辑起点,代表着该民族的思维方式。陈伯海认为,“是之为是”(being as being)<sup>④</sup>和“有生于无”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探究世界本原的两种不同进路,这两种思考世界最高“存在”的理路分别与作为存在动词的“be”和“有”必定有着某种关联(陈伯海 2009)。

### 2.1 英语基本存在动词“be”的哲学理据

西方哲学的“being”相当于汉语的“存在”、“有”、“是”等词的综合。从语法上看,“being”是系词“be”的分词形式,同时也是其动名词和名词形式,表示“存在”(being)和“存在者”(beings)。“being”如何成为哲学上表示“存在”的概念,这一问题在此须要追问。我们首先来看“philosophy”(哲学)一词的起源。该词源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phil(o)”和“sophia”两个词复合而成,前者意为“爱”、“追求”等,后者意为“智慧”,可见,热爱智慧是古希腊人最初为哲学界定的方向。当古希腊人执着于追求智慧时,必然要提出“智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一经提出,使得古希腊人不知不觉地把本应在事物“是其所是”(be what to be)的“是”(be)的过程中所体察到的智慧当作一种“所是”(what to be)来看了(俞宣孟 2005: 4-7)。这样,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跟系词“是”(be)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再来看“ontology”这个术语。从词源学看,英文的“ontology”、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和拉丁文的“ontologia”均源于希腊文,由“ont”和后缀“-logy”组合而成。“on”是希腊语系词“einai”(be)的中性分词,等同于英语的“being”;“ont”是“on”的变体,其词缀以“-logy”表示“科学”或“学说”,以此表明“ontology”是一门关于“on”亦即“being”的学说。作为“einai”的分词,“on”的意义由“einai”所规定。尽管“einai”据其语境有不同的意义,但其最基本的功能为系词“是”(be)。也就是说,“ontology”这一术语清楚地显示自身与系词“是”(be)的关系。

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古希腊最早把“being”<sup>⑤</sup>作为哲学概念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其哲学的全部旨意在于探寻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即在“是”与“不是”之间做出选择。他在其著作中说道“第一条是:是,不可能不是,这是劝谕女神(Persuasion)的途径(因为她留意于真理);另一条则是:不是,必不是,这一条路,我告诉你,是一

条完全不能有所察觉的道路”。<sup>⑥</sup>巴门尼德通过对“是”(being)的思考和阐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奠定了西方哲学“ontology”的基础。从柏拉图时代的公元前5世纪起,“on”(being)便被认为有动词和名词两种意义。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中,“是”(being)是各种理念即“是者”(beings)能够“是其所是”的根本途径,换言之,“是”(being)这个词揭示并表达各种理念之间的关系(俞宣孟 2005: 15)。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把“einai”(be)的阴性分词“ousa”改写成“ousia”,借以表达“是”(being),并将其列为10个范畴之首,是其他范畴的载体或基质,因而把以“ousia”(being)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称为第一哲学。从亚里士多德至黑格尔(Hegel)时代,“ontology”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处于各学科之首。“being”作为西方哲学最高的普遍原理可用以泛指一切存在,因此成为“ontology”这门学问的逻辑起点,它把其他各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是者”(beings)均当作属性,可以从它逻辑地推导出来(俞宣孟 2005: 16)。

作为西方哲学最高、最具普遍性、可泛指一切存在的概念“是”(being),其意义由作为系词的“是”(be)所规定。当“being”被哲学家阐发而成为哲学表示存在的概念后,又反过来强化系词“be”表述存在现象的功能,这正是英语以“be”为基本存在动词的理据所在。其实,不仅英语如此,整个印欧语系诸语言中以“be”为基本存在动词是普遍现象,如“我们班有30个学生”,翻译成印欧语系的几种语言分别为:

⑤ 冰岛语(属日耳曼语族): pað eru 30 nemendur í bekknum okkar.

⑥ 丹麦语(属日耳曼语族): Der er 30 elever i vores klasse.

⑦ 意大利语(属拉丁语族): Ci sono 30 studenti nella nostra classe.

⑧ 西班牙语(属拉丁语族): Allí somos 30 estudiantes en nuestra clase.

⑨ 俄语(属斯拉夫语族): V nashem klase (est) 30 uchenikov.

冰岛语的“eru”,丹麦语的“er”,意大利语的“sono”,西班牙语的“somos”,俄语的“est”都相当于英语的“are”。俄语相对特别一点,“est”可以省略。印欧诸语言如此普遍地以“be”为存在动词并非偶然,而是整个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的折射。

## 2.2 汉语基本存在动词“有”的哲学理据

陈伯海(2009)关于“有生于无”是中国哲学探寻世界之本原或存在的基本思路的论断,或许

仅为一家之言,但从“道”、“有”、“无”3者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哲学最高、最普遍的存在范畴,却是中国哲学界的共识。

在老子《道德经》一书中,“道”为宇宙无限运动的整体过程,而这一无限运动过程依据于“有”和“无”相互生化的机制:从“无”到“有”,从万物生成到各复其根,“无”生“有”,“有”复归于“无”,“有”、“无”相生。“无”为“名天地之始”,“有”为“名万物之母”,即“无”是天地形成的本始,“有”是化生万物的根源。事物续生过程中,“道”以“无”为体,以“有”为用,两者互相生发,反复循环。“无”和“有”可以推导出宇宙万物的存在,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是宇宙整体过程即“道”存在的根本原因和动力。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老子关于“道”、“有”、“无”3者关系论述的模糊性导致后人对其解读产生各种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两个:第一,从“有无相生”出发,认为“道”统摄“有”和“无”,“有”和“无”是一对对等概念;第二,从“有生于无”出发,认为“无”高于“有”,“无”即是“道”,“有”从“本无”的“道”中产生。

庄子不满足于老子“有生于无”的界定,把宇宙本原往前推进,力图找到比“无”更纯粹的本原。《庄子·庚桑楚》篇云:“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庄子一改老子有无统一的观点,将“有生于无”的源头推向了“纯无”(陈伯海 2009)。老庄之后,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从“有生于无”着手,用形名学的方法诠释并创造性阐发了“道”和“有”、“无”的思想,“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在王弼看来,“无”为“无形无名”的形上本体,“有”为“有形有名”的具体世界,“道”与“玄”、“深”、“大”、“微”、“远”都是对“无”这一本原的某个方面的指称(何石彬 2005)。

从老子的道统有无、有生于无、有无相生到庄子的“纯无”,到王弼的“无”高于“道”,“道”、“有”、“无”3者关系成为把握中国哲学“形上之思”逻辑起点的关键,只有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体悟并把握世界的本原。综观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有”、“无”的讨论,归纳起来,“道”或“无”为形而上的宇宙本体,为中国哲学最高的、外延最广的存在范畴,“有”代表形而下的具体万物,即人们所体察到的具体世界的一切存在物。因此,“有”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汉语基本存在动词的角色,这是由中华民族对“存

在”问题的看法所决定的。从词源学角度看,“有”原初表征“以手持肉”,其词义表示“占有”,可“有”一旦成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有”,其表达“存在”的功能便得到了强化,这也就是“有”字存在句在数千年的汉语史中如此稳定的根本原因。

### 3 “be”的时间性特质与“有”的空间性特质

#### 3.1 英汉存在动词的动词性差异

一般认为,存在句是一种静态句,存在动词不表行为。从英汉基本存在动词“be”和“有”,我们确实看不出其动作行为,但是以下语言事实却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所谓的“不表行为”的“be”和“有”的明显差异。

- ⑩ a. There is a bus stop near my house.  
 b. There was a bus stop near my house before.  
 c. There will be a bus stop near my house soon.  
 d. There had been a bus stop near my house before I moved in.

⑪ 红黄蓝白黑这些字中总有着会使我们见不着明天的。

⑫ 村子里有了电。

⑬ 历史中曾有过黄巢、张献忠。

在⑩的四个句子中,“is”、“was”、“will be”和“had been”是“be”的各种语法表达形式。显然,英语基本存在动词“be”跟时、体等范畴紧密相关,这些语法特征充分说明“be”虽不及行为动词的动词性强,但依然具有明显的动词性,具有与其他动词同等的丰富语法形式。

再来看汉语“有”的动词性。作为孤立语,汉语缺乏形态变化,通过在动词后面加动态助词“着”、“了”、“过”表达时体范畴,所以,能不能带“着”、“了”、“过”是鉴别汉语动词的动词性的基本标准。在对老舍500多万字的小说作品的统计中,我们发现,“有”可带“着”、“了”、“过”,但语频极低,“有着”只有1例,“有了”123例,“有过”6例,如⑪、⑫、⑬。同时,“着”表动作或状态持续的功能正在逐渐削弱。总之,“有”所表现出的动词性不仅弱于“be”,甚至弱于本来就是孤立语的汉语的行为动词。

#### 3.2 西方哲学存在(being)、时间的同一性与“be”的时间性特质

巴门尼德在提出那个超越一切的“是”(being),即汉语所谓“存在”的时候指出,思想与“是”是同一的,不能被思维的东西就不是“是”的

东西,他把思维活动与存在等同起来。同时,巴门尼德把“是”当做一种现象过程。巴门尼德以前或同时代的哲学总是追问“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把“本源”或“始基”视为某种确定的东西,并把“本源”或“始基”视为万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与依据,如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等。巴门尼德所思考的则是这个世界是如何呈现的,他认为“是”(being)是“是者”(beings)的原因,即“是者”(beings)是在“是”(being)的过程中得到显现。可见,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强调存在物的自我呈现过程,其时间性不言自明。

正是出于对“存在”时间性的呈现过程的高度关注,西方哲学才总是把“存在”(being)以及与之相当的概念,如“理念”(idea)、“实体”(substance)、“真理”(truth)、“现象”(phenomenon)等跟“时间”联系起来思考。然而,限于其哲学体系,康德(Kant)以前的哲学家,如奥古斯丁(Augustinus)、笛卡尔(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黑格尔等,在讨论时间问题时常常陷入两难,因为既然要表达上帝、实体、真理这类永恒存在,就不能过多地思考时间。一旦考虑时间,就必将面对变化、差别、流逝等问题,这与强调永恒、持存的“存在”是相悖的。因此,对于那些力图面向时间的哲学家而言,把时间作为他们哲学思想的“注脚”是不得已而为之(罗松涛2008:12)。但是,时间作为存在的一种方式,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却论述得非常清楚。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存在方式是永恒,受造物的存在方式是时间。笛卡尔认为,存在是实体,时间是实体的一个样式。斯宾诺莎继承了这一观点。黑格尔则认为,时间是通达永恒真理(存在)的一个途径。

从康德起,哲学家开始摆脱形而上学时间观的传统,试图改变时间的“注脚”地位,确立其优先地位(罗松涛2008:13)。这些哲学家包括康德、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人。康德把他的哲学思考重点放在空间和时间学说的讨论上,认为时间不是来自经验概念,相反,惟有以时间的表象为前提,方可获得关于事物存在的同时性或继起性的观念,时间作为感性的直观形式而被内化为认识主体的一个先天条件。而在胡塞尔看来,内在时间意识与意识体验的普遍性结构中的其余一切意识和结构都以时间为前提(罗松涛2008:17)。时间是胡塞尔现象学中一切体验的普遍特性,他甚至直接把体验看做内在反思中呈现的统一时间过程。他认为,对象是被意识活动“构造”出来的,意识本身就是时间性的(王恒2006:

11-12)。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首先在基督教中发现了时机性,后来又同亚里士多德的时机性概念结合起来,并将基督教的时机性彻底化,形成了自己的时间观(朱清华 2009:130),其哲学名著《存在与时间》成为西方哲学对“存在”的时间性阐述的巅峰之作。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关系,海德格尔一改以往艰深晦涩的语言风格,直接而明确地指出,存在(being)就是时间,不是别的东西(海德格尔 1987:214-225)。时间被称为存在之真理的第一个名词,而这个真理乃是存在的呈现,因此也是存在本身……由于时间,存在才被显露出来,所以,时间表示出“无蔽性”,也就是说,表示出存在的真理<sup>⑦</sup>。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无论作为“注脚”的时间还是取得优先地位的时间,都被当做一个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东西成为考察“是”(being)的视域。“是者”(beings)即存在物是在自身“是”(being)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换言之,“是者”(beings)的存在需要通过“是”(being)的时间性的呈现来实现。把“存在”(being)放在时间视域中进行思考,甚至把两者等同起来,这种思维方式是“be”时间性特质鲜明的根本原因。

### 3.3 中国哲学的整体观与“有”的空间性特质

中国哲学是一种空间导向性的思想,整体性思维方式是这一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整体观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个发展史,时空统一、天人合一等思想是这种整体观的最好注解,“宇宙”一词本身就体现这种整体观。“宇”、“宙”并举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见于《文子》、《尸子》、《庄子》等先秦著作。《文子》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为空间,“宙”为时间,空间和时间构成宇宙整体,我们既不能单用“宇”来指称宇宙,也不能单用“宙”来指称宇宙。中华民族整体思维的发端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到《易经》成书时,整体地观察世界已经成为一种牢固的思维方式。《易经》艮卦卦辞云“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比喻只顾局部不获整体,反映了将整体视为事物之本质和主旨的思想(刘长林 2011:46)。道家的“道统有无”和“有生于无”与儒学之精髓“天人合一”等思想正是建立在发轫于《易经》的宇宙整体观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整体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整体观视野下,个体事物与其所处之整体的空间关系是其众多属性中的首要属性。中国哲学侧重对事物之间空间关系的把握,而不像西方哲学关注存在物时间性的呈现过程,这反映出中华民族

强调和偏重空间表述的思维特点。

诚然,中国哲学也注重时间问题,儒、道等思想流派都把宇宙当做一个流转不息的整体,并把符合宇宙的时间作为实践的基本准则,如《礼记》的“礼也者合于天时”;《周易》的“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儒家的“时中至诚”;老子的“惟恍惟惚,其中有象”;庄子的“应于化而解于物”。然而,囿于宇宙整体观的思维模式,中国哲学从未有过把时间作为视域来思考存在问题的尝试,从未出现形而上学的时间概念,更没有像西方哲学对时间本身的客观实在性以及时间与因果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严肃的追问(吴学国 2011)。

如果说宇宙整体的本原是“道”或“无”,“有”就是“道”和“无”派生出来的具体万物,它在那里并为人们所感知。至于“有”是如何有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从未揭示其运作机理这种时间性过程。中国哲学的“有”仅代表形而下的具体万物,不包含从“无”到“有”的转化过程,也不像西方哲学的“being”负载“自我呈现”这一功能。“手里有一块肉”这类句子,仅表达“一块肉”在“手里”,“有”只不过是连系整体空间“手”和个体事物“肉”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在现代汉语中可以换成“放着”、20“摆着”、“摊着”、“抓着”、“拿着”等,也可以换成“是”。

## 4 结束语

由系词“be”而来的“being”经古希腊哲学家的阐发逐渐成为西方传统哲学表示存在的最高范畴,“be”表述存在的功能便随之得到了强化,这是英语等印欧语普遍选择“be”作为基本存在动词的理据所在。本义表示“占有”的“有”经由老子、庄子、王弼等人的阐发,逐渐成为中国哲学表示存在的范畴,与“道”、“无”一起构成中国哲学存在论的核心概念,“有”表述存在的功能因此得以强化和固定,这是汉语选择“有”作为基本存在动词并保持数千年稳定不变的根本缘由。

“be”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性特质,这源于西方哲学对时间的客观实在性的把握,把时间作为考察“being”的视域,强调“being”的“自我呈现”的时间性过程,甚至认为时间与存在是同一的。而汉语基本存在动词“有”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性特质,其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在整体性思维的框架内,侧重于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的表述,把个体事物与整体的空间关系视为事物之首要属性。也正是由于整体性思维方式,中国哲学从未把时间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阐释,更未曾将

时间作为视域来究索存在问题。“有”仅为处于宇宙整体之内的具体事物,而不负载“自我呈现”这一时间性功能。

#### 注释

- ①“ontology”有不少中译形式,如“万有学”、“实体论”、“存在论”、“本体论”、“万有论”、“凡有论”、“存有论”、“是论”等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存在论”和“本体论”。本文采用“存在论”的译法。
- ②西方哲学概念“being”(希腊语为“on”)在我国通常译为“存在”,但它源自系词“be”,因而包含“是”、“有”、“存在”等语义。若脱离其“是”的含义来讨论,必将产生巨大的偏差;若把“being”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固定地译为“是”,又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此,汪子嵩、王太庆(2000)主张采用比较灵活的中译方法,王晓朝(2000)则明确提出以语境法来翻译,即考虑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本语境和中国读者的语境。本文采用王晓朝的主张,根据表述的需要把“being”译成“是”或“存在”,把“beings”译成“是者”或“存在者”,并注明其英文形式。
- ③本文所说的“动词性”是指动词与时、体相关的语法特性,一般通过形态变化得到体现。
- ④根据对“being”理解的差异,“being as being”有各种翻译,如“是之为是”、“存在之为存在”。
- ⑤巴门尼德所说的“是”希腊文为“estin”,是系词“einai”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相当于英语的“is”。尚未名词化的“estin”充当主语,作为指陈的对象,在公元前6世纪的巴门尼德时代完全有可能。海德格尔曾讨论过这一问题,认为在柏拉图(Plato)时代(公元前5世纪)希腊语才区分动词和名词两种词类。因此,本文在行文过程中,提及巴门尼德的作为一个概念的“是”时,用“being”来标注。
- ⑥转引自俞孟宣《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9页。
- ⑦在此段文字的中译本原文中,“being”被译为“存有”。为了行文的一致性,本文均改为“存在”。

#### 参考文献

- 陈伯海. 释“有生于无”——兼探哲学“形上之思”的逻辑起点[J]. 社会科学战线, 2009(7).
- 顾阳. 关于存现结构的理论探索[J]. 现代外语, 1997(3).
- 海德格尔. 回到形而上学基础之路[A]. 考夫曼. 存在主义[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韩景泉. 英汉语存现句的生成语法研究[J]. 现代外语, 2001(2).
- 何石彬. 老子之“道”与“有”、“无”关系新探——兼论王弼本无论对老子道本论的改造[J]. 哲学研究, 2005(7).
- 李莹 徐杰. 汉英“是/Be”存在句的比较研究[J]. 渤海大学学报, 2009(5).
- 刘长林. 中国系统思维: 文化基因探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罗松涛. 面向时间本身——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1893-1917)》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
- 孙德林. 英汉存在句的结构、语义对比浅析[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0(6).
- 王恒. 时间性: 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王力. 中国语法中的系词[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37(1).
- 王晓朝. 读《关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几点意见[J]. 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0(5).
- 汪子嵩 王太庆. 关于“存在”和“是”[J]. 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0(1).
- 吴学国.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 俞孟宣. 本体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张达球. 英汉存现结构句法-语义关系诠释[J]. 外语研究, 2006(4).
- 张珂. 英汉存现构式中存现动词使用频率的认知对比研究[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8(6).
- 张律 胡东平. 关于图形-背景理论的英汉存现构式对比分析[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1).
- 张绍杰 于飞. 英语存在句信息传递再探索[J]. 外国语, 2004(2).
- 郑香清. 英汉存现结构的生成探索[J].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011(3).
- 朱清华. 回到源初的生存现象——海德格尔前期对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诠释[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Huang, C-T. J.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Chinese and (in) Definiteness [A]. In E. Eeuland. & A. Meulen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 Definiteness* [C].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收稿日期: 2013-10-02

【责任编辑 王松鹤】